

大上海的孤島歲月

陶菊隱 著



中華書局



5.1

大上海的孤岛岁月

陶菊隐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上海的孤岛岁月/陶菊隐著.-北京:中华书局,2005
ISBN 7-101-04731-9

I.大… II.陶… III.社会生活-上海市-1937~1945
IV.D693.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3011 号

大上海的孤岛岁月

- 著 者 陶菊隐
责任编辑 祝安顺(电话:010-63447747)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49 千字
印 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731-9/K·2025
定 价 28.00 元
-

出版说明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著名记者、作家。自1912年进入新闻界,陶菊隐在多家报馆担任通讯员、记者、编辑和总编辑,写作了大量通讯、报道、特写、述评和专栏文章。1942年退出报界,专注于文史著述。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

陶菊隐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有“菊隐丛谈”(二十五册)、《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督军团传》、《吴佩孚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抗战期间,陶菊隐蛰居上海,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写作了《天亮前的孤岛》和《最后一年》,于1945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陶先生对二书重加整理,编为《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以独到的眼光、生动的笔法,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记述了1937年至1945年间上海孤岛时期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蒙陶菊隐先生后人慨允,我们对此书重加校订,编配了各章的小标题,增加了100多幅历史图片,更名为《大上海的孤岛岁月》,重新出版。陶菊隐先生一生著述之绝大部分都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再版,是对陶菊隐先生的纪念,更是他与中华书局常年合作而留下的深厚情谊的延续。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5年6月20日

• 目 录 •

• 炮火中的上海 •	1
• 蒋介石的和平梦 •	18
• 建筑在沙滩上的天堂 •	27
• 后汉汪精卫袍笏登场 •	39
• 汉奸特务总部——“七十六号” •	65
• 暴风雨的前夕 •	71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上海 •	89
• 如此国际都市 •	102
• 所谓战时经济统制政策 •	110
• 日本侵略者加强镇压上海市民 •	121
• 日本军刀下的“敌侨” •	131
• 上海的大赌窟——证券大楼 •	140

• 目 录 •

• 所谓配给制和限价政策 •	152
• 南京伪组织对英美宣战 •	163
• 所谓“对华政策大转变” •	174
• 伪组织内部狗咬狗的斗争 •	182
• 伪组织强制收买棉纱棉布 •	190
• 伪组织“接收”上海两租界 •	203
• 日本侵略者的新花招——“和平走廊” •	210
• 寒冷的 1944 年 •	225
• 汪精卫毙命后的日伪残局 •	241
• 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	254
• 国民党对上海的大劫收 •	267

炮火中的上海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自1931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蒋介石对外坚持不抵抗政策，对内疯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使中国面临外寇深入、河山破碎、遍地烽火的最严重的局面，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6年，国民党爱国军人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影响下，发动了“西安事变”，把当时在西安布置进攻解放区的蒋介石扣留起来，迫使他接受联共抗日、开放言论、释放被捕爱国人士等条件。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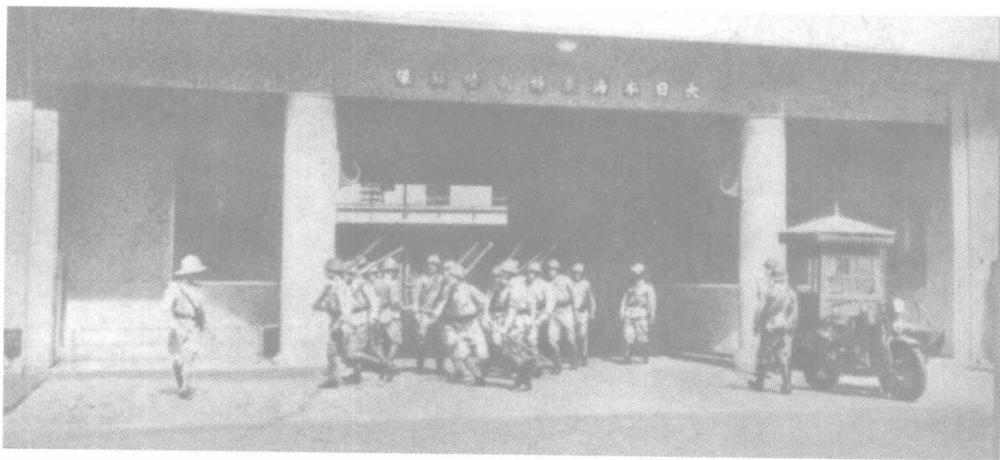
张学良(左)与杨虎城(右)

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仍然不作抗日的准备。他先后派蒋作宾、许世英为驻日大使，对于日本侵略者所提的“中日经济提携”、“中日共同防共”等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对于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希望存而不论；对于华北问题，只求表面上保持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可以接受日本侵略者所提的“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实际上他是愿意放弃东北、华北以交换日本侵略者不向南方进攻，以保持其偏安一隅之局。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谅解蒋的处境，一定要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调整中日邦交”的先决条件。蒋如承认这个条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不会答应，南京政府必将迅速垮台，因此谈判陷于僵局。

1937年春天，国民党政府派孔祥熙为庆贺英皇加冕特使，并叫他乘便到美国与罗斯福总统联系，随后又派张静江、胡适分往英、美两国活动，

希望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使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攻势适可而止。此时帝国主义已经分化为以英、美、法为一方和以德、意、日为另一方的两个敌对阵营,欧洲形势日益紧张,英、美两国无力兼顾远东,蒋介石依靠国际干涉以缓和日本进攻的打算也落空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北平(北京)附近芦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当地守军被迫起而应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七七事变”,即“芦沟桥事变”。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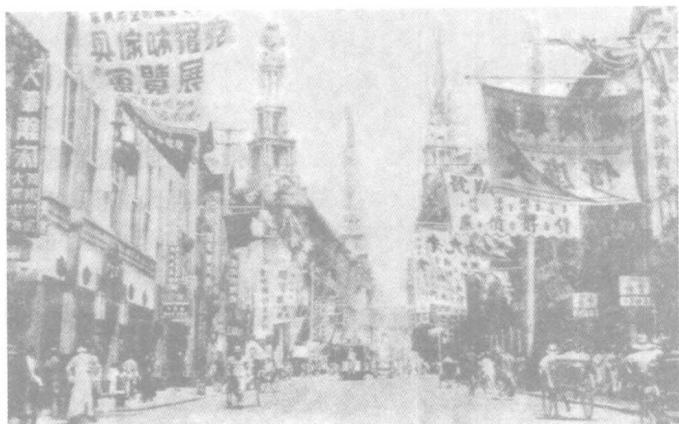


1937年8月13日,日本从设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出动时情形。

进犯吴淞、江湾等地。日军进攻上海,严重影响西方帝国主义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四大家族的利益。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严切督促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派兵应战。至此,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了。

租界中心的两场横祸 “八·一三”以前,上海的畸形繁荣正在逐步褪色,人口不断下降,社会购买力日益萎缩。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内,在马路旁的电杆子上,空屋出售或出租的告白日见其多,许多大房东用减租、让租(在租约成立之日起,三个月或半年内免付租金)或将房屋修饰一新等条件吸引新房客,但是过问者仍旧寥寥无几。市场方面,不少大商店登载“大拍卖”、“大放盘”的巨幅广告,宣称“不顾血本,推销存货”;南京路、福州路一带中小型商店甚至经常雇用音乐队吹吹打打,有的叫两个

店员站在柜台外长凳上大声叫嚷作滑稽对口，吹嘘价廉物美，以招徕顾客。但是买货的人远比看热闹的人少。其他服务性行业包括旅馆、酒楼、舞场、出租汽车等，也都门庭冷落，大非昔日可比。



高悬大廉价旗帜的旧上海南京路

但是，“八·一三”的炮声一响，迅速改变了整个上海经济萧条的趋势。当闸北战火掀起之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立即宣布“中立”。国民党市政府当天由江湾新市区迁回枫林桥旧址办公。居住在闸北、虹口等处的外侨和中国殷实之家，就像滚滚浪花一样涌进到苏州河南岸来。沪宁、沪杭两铁路沿线的大地主、大豪绅也都纷纷集中到这个“中立”之区来。因此，尽管租界外炮火亘天，杀人盈野，租界人口却在直线上升，所有



日军进攻上海后，居住在中国居民区的欧美侨民纷纷躲入英、美、法租界。

空屋很快就被填满了，优待新房客的种种条件也都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租屋的顶费（“二房东”出租房屋时向房客收取的一笔费用。例如自己租屋三间，分出一间租与他人，这时住客必须预先拿出一笔钱来给二房东，才能租住，这笔钱就称顶费）和过户费。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几十万市民涌进上海租界，躲避战火。

同一时期，闸北、真如、浏河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在炮火中无法安居，也都扶老携幼转移到租界来。仅“八·一三”这天，就有难民六万余人涌入租界。在这些人中有的用板车或老虎车，有的肩挑背负，把一些能够带走的东西都带到租界来。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

可归的难民，本拟拒之门外，曾将租界边沿的几扇大铁门紧紧关闭，但因人多势大，租界当局无法阻挡，只得将租界内若干学校、庙宇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他们一面“号召”各界人士捐助寒衣粮食，一面把山东、苏北、浙江等地的近地难民分批“遣送”回籍。但是，随着战区的继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无法全部收容，于是来得较晚的难民，只得在弄堂口或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这一情况，租界当局又认为有碍市容，曾经加以驱逐，但驱不胜驱，因此除南京路、霞飞路（今淮海路）等几条主要马路绝对不许停留外，其他各处也只得眼开眼闭，暂时不去管它了。这些劳动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横蛮无理地蹂躏他们的家乡，破坏他们的生产，无不切齿痛恨，对于西方殖民者的歧视和压迫，也都愤慨异常。他们在风餐露宿之中挣扎了一个时期，不久便纷纷选择租界偏僻地区搭棚而居，以个体劳动或摊贩为生。这就是“八·一三”以后上海棚户和摊贩大量发展的由来。

在上海的一个多月战争中，敌机在近郊各处疯狂投下烧夷弹，闸北一带化为火海，留在当地未走的人们，也不得不冒着炮火进入租界。因此，到9月中旬，租界人口迅速增加到三百万左右，租界外却成了十室十空的无人之区。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两租界宣布戒严，大部分商店停止营业，公共车辆全部停驶。从租界高处可以望见战区腾起的闪闪的火光，隆隆的炮声昼夜不停。租界铁门和各国驻军在租界边沿布置的沙包、鹿砦、铁刺网等障碍物，有时封闭，有时开放，搞得租界内也人心惶惶。但是，这种战时气氛不久又都



旧上海街头的修鞋摊

消逝了：由于人口迅速集中，特别是上海附近地区的地主富室纷纷避难前来，租界的畸形繁荣又告复活，旅馆、电影院经常客满，茶楼酒肆川流不息地吐纳着衣冠楚楚的人群，各种商店也无不生意兴隆。这些来自外地的阔老，是租界殖民者所欢迎的，因为他们对租界繁荣带来了好处。



旧上海会乐里妓院林立

由于上述情况，上海租界内外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联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但是，如果把租界内形容为完美无缺的“天堂”，那是幼稚可笑的，它也是“天堂”与地狱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另一鲜明的对比。就拿住居条件来说，有的崇楼杰阁，非常壮观，有的却几户人家拥挤在鸽子笼式的贫民窟里，晒台辟为卧室，阁楼上人堆人。至于人



1937年8月14日起,日军开始轰炸上海。日军对上海的狂轰乱炸受到国际社会严厉指责。

吃人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苦乐悬殊,这里就不多谈了。

以上情况,不过是上海发生战事后一瞬间的快速镜头。总的说来,租界人口的迅速集中,是由于不少人认为这个籍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在中日战争中成了一个“中立国”,安全不成问题。但是,租界是否如一般人所想的安全,这个

问题,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了明确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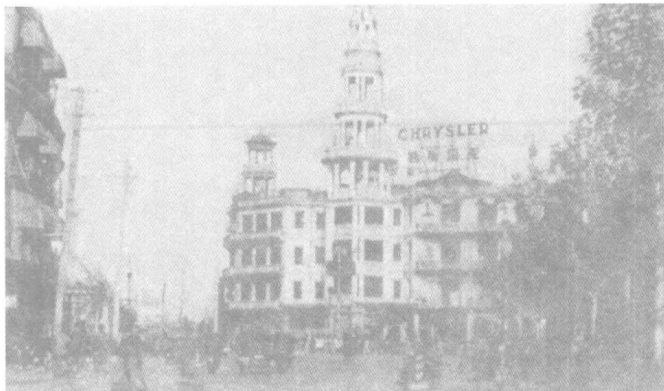
就在战事发生后的第二天,8月14日下午4时许,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与汇中饭店之间(今和平饭店的南北两部)的一段马路上,突然掉下来四颗炸弹,沙逊大厦楼下铺面花店、古董店、珠宝店的橱窗全部化为齑粉,汇中东楼被炸去一角。马路上有轨电车的电线也被炸断。这是上海租界区的第一次被炸,给上海市民上了战争的第一课。

相隔约半小时,租界市民又听得飞机掠过上空的轧轧之声。当时大家都有一种关心战局的心情,不少人站在高楼上或阳台上,有的跑到马路上看飞机。他们十分清楚地看见一架飞机的尾巴上吐出了一缕浓烟,有一件黑沉沉的东西从飞机上掉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天崩地裂般一声巨响,一颗炸弹不偏不歪掉在大世界十字路口。站在街心螺旋形铁架上指挥交通的越南籍巡捕立即坠落下来,化为一团肉酱。铁架偏南约一码之地的马路上也炸成了一个深约一丈多、直径约两丈的大窟窿。大世界的天棚被全部震毁,附近中西药房、五味斋食品店的橱窗玻璃都被震碎。这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分界的一条马路,车辆与行人往来如织。适有公共汽车两辆、私人汽车十余辆经过其地,马路上就像飞来一阵红雨一样,车中乘客血肉模糊,死伤共达四百余人;各种车辆的残骸东歪西倒地

躺在柏油马路上，有的还在冒烟燃烧。出事后约一刻钟，各路救护车才横冲直闯地疾驶而来，两租界也派来大批捕探施行警戒，断绝交通，打扫现场。

这是上海市民在“八·一三”后所上的第二课。这一课使他们懂得，在兵慌马乱的时代，没有一处能够保证安全。

大世界出事后的第二天，各报都有记载说，一架中国飞机出击停泊黄浦江中的敌舰“出云号”，被高射炮击中弹架，因而滑落了炸弹两枚。这是国民党官方企图减轻责任的一种说法。根据市民所见，当时有中国战斗机四架向这艘日本旗舰俯冲投弹，炸弹均落在水中，内有一机被高射炮击中，因而尾部冒烟。大家推测，机中驾驶员打算飞往虹桥机场降落，为了减轻机身的重量，想把炸弹扔在跑马厅的广场上（今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合起来的地方），但因心慌意乱，炸弹落在大世界十字路口，闯了一场大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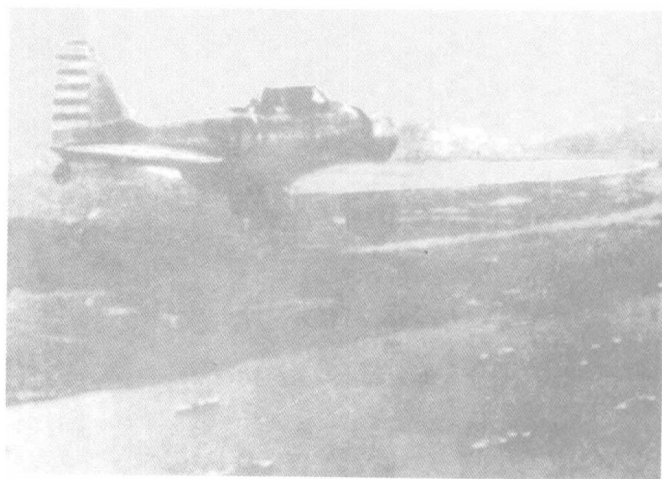


旧上海大世界外景



藏污纳垢的旧大世界内景

8月15日，中国飞机继续向“出云号”投弹均未命中，敌舰连珠般高射炮向偏西方发射，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张家花园一带落下炮弹不少，伤妇女小孩数名。作者住在辣斐德路、金神父路（今复兴中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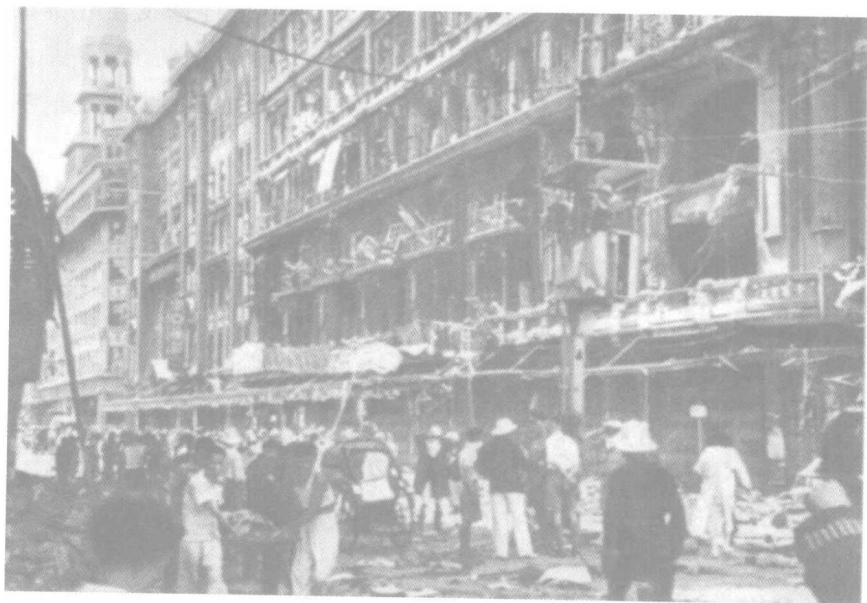


正向黄浦江日本军舰攻击的中国战斗机

瑞金路)附近,正在家中午睡,也有一颗高射炮弹穿屋瓦而下,可见这一天还有更多的地点落下炮弹,为了安定人心,租界当局没有全部公布出来。

8月23日,也就是大世界出事后的第九天,上海市民又上了第三课。这次事件发生在下午1时,正是租界东区职工中午上下班最繁忙的时间。出事地点在南京路、浙江

路口,这个地方不但行人肩摩踵接,而且车道纵横交错,正是反映上海租界人口高度集中和市面畸形繁荣的中心地点。炸弹落在先施公司(今南



1937年8月23日,日军把炸弹投到上海市中心先施公司门口,炸死市民700多人。

京路服装公司)三楼东南角阳台上,水管被击破,自来水就像瀑布般急剧地冲泻下来。新落成的十八层永安公司大楼以及由南京路到劳合路(今六合路)一带的商店橱窗玻璃尽被震毁,玻璃碎片满天飞,铺在路面上像一条长长的水晶地毯。炸弹落下来的时候,站在南京路、浙江路中央铁架上指挥交通的印籍巡捕,立即粉身碎骨,头颅不知飞向何处。马路当中和人行道上到处躺着断肢折臂的尸体,有人压在积尸下尚在呻吟。有一辆由东向西的双层公共汽车,被炸毁在浙江路东面大中华电料行门首,车中尸体纵横,没有发现一个活人在内。这次事件死伤共达七百余人,其中死者约百余人。事后国民党官方没有说明炸弹从何而来。根据市府方面的调查,事件发生的同时,四川路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后面美国海军堆栈也发现了一颗未爆炸的烈性炸弹,弹头有黄色 S. S. No. 6 标记,显然这是敌机投下来的。他们还推测说,日本侵略者可能误接情报,认为有中国高级军官数人在东亚饭店开会,因而下此毒手。这当然又是一种假设之词。但上海市民却又纷纷传说,出事时没有人看见飞机飞越租界,没有人听见飞机的轧轧之声,而炸弹来自东方,可能不是飞机投下来的炸弹,而是浦东方面中国陆军发出来的一颗开花炮弹。

事件发生后,驻沪美国舰队司令雅纳尔、英国舰队司令李德分别致函上海市长俞鸿钧和日本舰队司令长谷川,抗议中日两国飞机飞越租界上空,要求以后勿再发生同样事件。

以上是“八·一三”以来租界上造成重大死伤的两次事件。至于租界内流弹伤人,特别是在黄浦江边、苏州河畔和租界边沿发生的伤亡事故,几乎无日无之。截至 10 月 12 日止,租界市民中流弹而死者 2,057 人,伤者 2,955 人。

尽管上海租界并不安全,但是人们认为这不过是“飞来之祸”,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他们相信,日本侵略者断然不敢与英美两大国为敌,不会肆无忌惮地冲进租界来。尽管战争已经扩大到沪宁、沪杭沿线,但外来人口仍在不断涌入,因此租界人口上升的幅度愈来愈大。

上海社会团体、妇女界和市民的抗日倾向与爱国活动 “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租界出现了许许多多抗日救亡团体和救济性的临



上海左派人七(左起: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史良、邹韬奋、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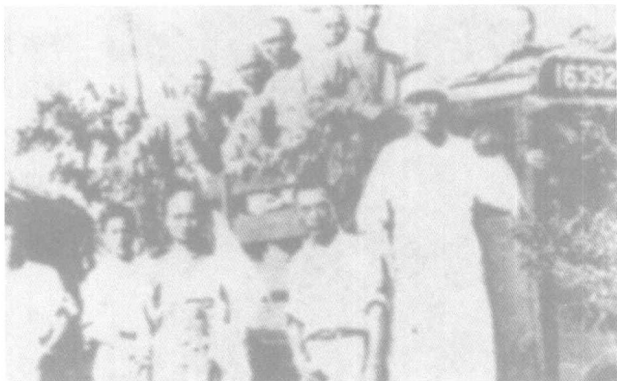
时组织。这些团体的背景,有的是左翼革命派组织起来的,有的由爱国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主持,有的以民族资产阶级或外交界人士为核心。在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也有由国民党人士与左翼人士联合组织的。

这些团体虽然均以抗日救亡为号召,

可是由于背景的不同,所走的路线也不同。在内政问题上,左翼革命派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决主张开放一切民众运动,实行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政治犯,结束一党训政,成立一个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以国民党CC系为核心的团体,则提出所谓“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反动口号,反对发动民众,反对开放政权。这些人及其追随者们,以民间姿态组织团体或者加入某些进步团体,其目的在于侦察社会动态,分化左翼阵营。在外交问题上,左翼革命派主张争取一切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们的帮助,反对牺牲中国以绥靖日本的国际阴谋。国民党人则寄托希望于西方三大国,特别希望英美两国出来调停中日战争。在军事问题上,左翼主张坚持抗战,反对中途妥协,主张全民抗战。这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又是背道而驰的。此外,一般知识分子组织的团体,无论在内政问题、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上,都缺乏鲜明的旗帜和坚定的立场,他们主张开放政权,反对个人独裁,这是与左翼革命派一致的,但对号称“民主”的某些西方国家抱有幻想,特别希望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国的联合会议上,能够作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压迫日本政府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一点又与国民党人共鸣。

“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妇女界的救亡活动也很活跃。她们举办过书画展览会、义卖作品，用以慰劳前方将士。还举办过妇女捐献首饰以及其他募捐、义卖活动，分别作为慰劳将士和救济难民之用。妇女活动也和其他团体一样，由于成员们的阶级成分不同，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和倾向。

除团体活动而外，上海市民自发性的抗日斗争和爱国活动，也在广泛开展。从战事发生的一天起，上海各报的销路突然大增，每次发行号外，立刻抢购一空，这是上海市民关心军国大事的热情表现。当时市井流传，有的说日本间谍化装为中国难民，混进租界来侦察中国方面的各种情报，有的说日本浪人指使汉奸在近郊河塘放毒，勾结奸商运粮接济敌军，或将日货改装国货出售牟利等等，因此捉汉奸、检查日货和搜捕奸匪的事件层出不穷。上海各界人士发起“一元救国捐运动”，劳动人民热烈响应，纷纷将血汗收入送请银行或报馆代收，大多不肯留名而去。这些行动，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上海僧侣参加支援前线的活动

国民党军在上海的大溃败 蒋介石被迫对日应战后，在国民党首都南京组织了中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大本营，作为战时的最高机构，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所提倡的结束一党训政、组织联合政府、发动全民抗战等主张。这个机构设立了五个部，分掌军令、政治、军需、国外宣传、国内宣传等事项。由于这个机构的成立，南京各党政机关的许多重要职权都移归五个部办理，因此它变成了一个权力高于一切的太上政府。根据各国通例，陆海空军大元帅应由国家元首担任，蒋介石上面还有一个名义上是“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他不便公开僭号称尊，所以这个机构简称为“大本营”而未正式挂出招牌来。更重要的是，当时国民党不是真心